

# 政府管制、法治、银行发展与 中小企业发展

李 涛\*

**摘要** 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措施、法治和银行业的发展程度对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影响。我们发现，以案件审理司法程序的正式性衡量的法治水平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稳定的作用，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准入管制、劳动用工管制、征信管制以及退出管制在内的政府管制措施以及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不稳定或不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法治论”，而否定了“政府管制论”和“银行发展论”。

**关键词** 政府管制，法治，银行发展，中小企业发展

## 一、引言

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当今世界各国受到普遍重视。<sup>1</sup>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人口、推动技术创新以及加速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具有相对优势(Hallberg, 2001; Ayyagari *et al.*, 2003)。有关中小企业的研究集中探讨了这些相对优势。首先，Snodgrass and Biggs (1996) 分析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34个国家的工业统计数据，发现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作用更大。其次，Harvie (2003) 以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地区为例，说明了中小企业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减少贫困人口。第三，Acs (1984) 认为作为行业新成员的中小企业能够带来技术创新。以新产品和新工艺流程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Acs and Audrestsch (1988 和 1993) 发现技术创新是由刚刚加入行业的中小企业，而不是由作为行业“在位者”的大企业所带来的。第四，国际金融公司(IFC)发布的有关印尼、泰国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国的研究报告都强调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东南亚以及中亚地区经济的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Harvie and Lee (2002) 也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离不开中小企业

\*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电话：(020) 84115130；E-mail：litao@lingnan.net。感谢香港科技大学李稻葵、北京大学武常岐、姚洋以及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当然作者文责自负。

<sup>1</sup> 中小企业可能存在于正式经济和地下经济中。本文主要考虑了前者。有关地下经济的分析见 Friedman *et al.* (2000) 和 Johnson *et al.* (1997)。

的发展。

然而这些文献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发程度，是政府的管制措施、法治水平，还是银行业的发展程度？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比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重要。研究中小企业的作用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而如何推动中小企业发展，这又离不开我们对其决定因素的准确把握。

总结以往研究中小企业发展的文献，对其决定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首先，一种理论认为政府的管制措施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我们称之为“政府管制论”。根据世界银行一项有关政府管制的研究（World Bank, 2003），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管制措施可以分为四类：准入管制、劳动用工管制、征信管制、退出管制。

(1) 准入管制：Djankov *et al.* (2002) 系统研究了准入管制的成因以及影响，从而检验了有关准入管制的两种理论，即公众利益说和公共选择说（包括管制俘获说和过路收费亭说）。公众利益说认为准入管制可以避免市场失灵造成的公众利益损失，如 Pigou (1938)。通过实施准入管制，政府可以保证从业厂商具备一定的声誉，进而保证整个行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一般成立时间短，企业声誉低，消费者获取相关企业信息困难，因此政府更加有必要对中小企业进行准入管制，防止损害消费者行为的产生。而这些管制措施也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经营水平，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此相反，公共选择说认为准入管制会降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Tullock 1967; Stigler 1971; Peltzman 1976)。Stigler (1971) 认为行业“在位者”通过俘获政府，实行准入管制，可以增加垄断优势，减少竞争，创造租金，而这些都是以消费者福利减少为代价的（即管制俘获说）。Shleifer and Vishny (1998) 指出准入管制体现了政治利益，这是因为政府官员可以通过实施准入管制获得租金（即过路收费亭说）。McChesney (1987) 和 De Soto (1990) 也持相同观点。根据公共选择说，对中小企业的准入管制是为了保护行业“在位者”的利益或政府官员的利益。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实力弱，更容易受到准入管制的影响，因此准入管制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2) 劳动用工管制：Botero *et al.* (2003) 通过比较世界上 85 个国家有关劳动就业的法律，分析了劳动用工管制的成因和影响，并检验了决定劳动用工管制程度的三种理论：效率说、政治权力说、法律体系说。我们认为前两者可以进一步提供分析劳动用工管制对中小企业发展影响的理论框架。效率说认为劳动用工管制的产生是由于其实施成本小于收益 (Demsetz, 1967; North, 1981)，而具体的管制措施体现了政府处理与劳动用工相关的民事侵权行为和市场失灵问题的政策偏好 (Glaeser and Shleifer, 2002 and 2003)。一方面，Blanchard (2002) 指出由于发达国家的征税成本较低，因此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社会保障而不是直接监管劳动用工；而另一

方面，Djankov *et al.* (2003b) 认为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滥用政府权力，如通过劳动用工管制来避免企业解雇冗员，因而从潜在的管制成本考虑，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较少地实施劳动用工管制。由于中小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与大企业相比，比较不规范，因而从提高社会效率计，政府更应当对劳动用工进行管制，但是就管制措施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效率说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预期。政治权力说认为劳动用工管制是当权者谋利之举，不论其是为争取左翼选票 (Esping-Andersen, 1999; Hicks, 1999)，还是受利益集团影响 (Olson, 1965; Becker, 1983)。由于中小企业雇员较少，资金实力薄弱，因此对选举结果影响较小，同时也难以形成院外集团影响政府决策，这使得劳动用工管制措施更多地体现了大企业的利益，进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3) 征信管制：信贷市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进而产生了信贷配给 (Stiglitz and Weiss, 1981) 等低效率的信贷分配机制。作为“信号机制”(Signaling) 的贷款抵押虽然可以部分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是对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它们可抵押的固定资产较少，因此抵押贷款在处理中小企业信贷问题时的作用较小，而作为“甄别机制”(Screening) 的征信制度更为有效。征信机构包括公营和私营两种，它们在搜集、提供信息时可以互为补充 (Miller, 2003)。Pagano and Jappelli (1993) 从理论上说明了在竞争性的信贷市场上，通过征信制度在贷款方之间形成信息共享，可以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且有助于建立一个有效约束借款人的声誉机制；而非竞争性的信贷市场不能够实现征信机制的以上作用。Jappelli and Pagano (2001) 的实证分析发现不论是通过公营还是私营的征信机构进行信贷信息共享，都可以提高银行贷款额，同时降低坏账比率。Love and Melenko (2003) 发现在存在着私营征信机构的国家，中小企业的银行融资比例较高。与大企业相比，由于中小企业主动登记信贷信息的动机较弱 (Jentzsch, 2003)，因此征信管制有助于增加贷款人对中小企业信贷记录的了解，减轻中小企业的信贷困难，进而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一个竞争性的信贷市场是征信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4) 退出管制：作为企业退出方式的破产程序与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企业的退出管制一方面要保护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也要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Claessens and Klapper, 2002)。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实践中难以事先拟定一个有关破产公司资产处理的完全契约，因此有效的政府对企业破产的事后管制可以避免产生多个债权人之间对破产公司资产的无序争夺，进而避免给债权人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失 (Hart, 1999)，从而鼓励了债权人给予企业贷款支持，推动企业发展。但是，一个有效的企业破产程序也应该考虑到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防止过度强调债权人利益而可能导致的有自生能力的中小企业的过早破产 (Claessens and Klapper, 2002)。

其次，另一种理论认为，以司法程序正式性衡量的法治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我们称之为“法治论”<sup>2</sup>。季卫东（1993）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法律程序对于实现法治的重要意义。而 Djankov *et al.* (2003a) 则从经济学角度对法律程序进行了研究。他们比较了世界上 109 个国家的法庭在有关逐出欠租的租户和兑现被退回的支票的两个案例审理中表现出的司法程序的正式性 (Procedural Formalism)，并探讨了司法程序正式性国际差异的成因以及影响。司法程序的正式性体现在如下方面：法官和律师必须是专业人员，起诉和抗辩、证据呈堂、庭上各方陈词的程序都是事先规定的，审理进程采用书面记录形式，对一审判决不服可以选择继续上诉等。一方面，高度正式化的司法程序可以方便统治者控制判决结果，保护其支持者，惩罚其反对者，而法官只是一个宣布判决结果的工具 (Djankov *et al.*, 2003a)；而另一方面，高度正式化的司法程序保证了案件审理过程的一致性，并且可以防止由于原告或被告通过行贿、恐吓或政治干预法庭审理而引致的不公正结果 (Rudolf von Jhering, 1898)。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可利用资源较少，对统治者的吸引力弱，而且难以影响法庭审理，所以高度正式化的司法程序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控制而容易产生对中小企业的不公正判决。但是另一方面，高度正式化的司法程序可以避免可能的“制度扭曲”，从而以中立的形式保护了相对弱小的中小企业一方。因此理论上关于司法程序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有着截然相反的预期。

第三，还有一种理论认为银行业的发展程度，包括发展水平和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我们称之为“银行发展论”。

(1) 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一种观点认为，在银行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企业发展会受到外部融资困难的制约，如 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 (1998) 和 Rajan and Zingales (1998)。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 (2001) 发现中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更容易面临由于融资困难引致的增长困难。在这些国家，大型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在配置资本以及监督投资项目方面要比外部的资本市场或金融机构更为有效，而中小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受规模限制难以做到。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与银行业的发展水平正相关。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大企业的代理人问题更严重，而且外部投资者很难监督并处理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来避免内部人控制，而中小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较少发生，对银行提供的外部监督作用的依赖性较少，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与银行业的发展水平负相关。

(2) 银行业结构也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一种观点认为，与竞争

<sup>2</sup> 法治水平的测量有着多种指标。与 Djankov *et al.* (2003a)一致，与一般性的法治指标相比，我们对法庭在处理纠纷时遵循的具体司法程序所体现的法治水平更感兴趣，即司法程序的正式性程度。因此，本文在衡量法治水平时，主要考虑了司法程序的正式性程度。这也符合司法程序在决定法治水平时重要作用的论断，如季卫东(1993)。

性的银行业结构相比，垄断的银行业结构下，企业获得贷款比较困难，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Guzman (2000) 发现银行垄断会导致信贷配给，进而影响中小企业的资本积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Beck *et al.* (2003b) 以世界上 74 个国家为例，发现银行集中度会增加企业借款困难，降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而这种关系在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不利于中小企业成长。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等问题会使得垄断性的银行业有利于企业获得贷款。Petersen and Rajan (1995) 证明具有垄断力量的银行倾向于和中小企业等成长性企业建立长期借贷关系，从而分享未来企业成长带来的收入。Marquez (2002) 发现银行之间的竞争性越强，借款人信息就越分散，银行甄别借款人的效率越低，从而制约了企业获得贷款的能力，影响了企业的发展。Cetorelli and Peretto (2000) 总结为，垄断性的银行业结构一方面减少了总的贷款额，但是另一方面增强了贷款人甄别借款人的动机，从而提高了贷款效率，因此最优的银行业结构既不是完全垄断，也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寡头垄断。

然而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可能受到经济发展水平<sup>3</sup>，包括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影响（林毅夫、李永军，2001），从而出现了银行业发展程度的内生性问题（Allen and Gale, 1999）。在分析中，我们引入了人种差异度和地理纬度作为控制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内生性的工具变量。首先，一些文献建立了从人种差异度和地理纬度到银行业程度的间接渠道。Mauro (1995) 和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讨论了人种差异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a Porta *et al.* (1999) 指出“在人种差异度高的社会里，常常出现种族斗争的胜利者执政后剥夺失败种族，限制他们反对的自由，并且限制公共物品的提供”，这会损害经济增长。La Porta *et al.* (1999) 也讨论了地理纬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远离赤道的温带气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进而对经济增长可能有推动作用。Acemoglu *et al.* (2002) 指出，由于赤道附件炎热的气候不适于欧洲殖民者生存，他们在那建立一套资源掠夺型的制度，损害了赤道地区的经济长期增长。而经济增长与包括银行业发展的金融发展之间的正向联系在 Levine (2003) 的综述里有着充分的讨论。因此，这建立了一个从人种差异度和地理纬度到银行业发展的间接渠道。其次，Beck *et al.* (2002a) 直接分析了人种差异度和地理纬度对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这建立了一个从人种差异度和地理纬度到银行业发展的直接渠道。

<sup>3</sup> 从长期来看，政府管制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内生的可能，就这一点，我们赞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如 Rajan and Zingales (2002)。但是，就短期来看，我们可以将政府规制措施看做是外生的。已有的大量文献在研究政府管制措施的影响时，都把它们当作外生变量来考虑，如 Djankov *et al.* (2002) 等对准入管制影响的研究；Botero *et al.* (2003) 对劳动用工管制影响的研究；Djankov *et al.* (2003a) 对和约履行管制影响的研究；Jappelli and Pagano (2001) 对于征信管制影响的研究；Claessens and Klapper (2002) 对于退出管制影响的研究。有关政府管制措施的形成，La Porta *et al.* (1999) 做了深层次的探讨，其中并未涉及中小企业发展程度。

接渠道。

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也可能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Beck *et al.* (2003a) 发现中小企业份额与人均 GDP 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小企业越发达。Ayyagari *et al.* (2003) 也发现中小企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与人均 GDP 显著地正相关。

借助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即政府管制措施、法治和银行发展程度，本文检验了“政府管制论”、“法治论”和“银行发展论”在解释中小企业发展程度时的作用。

分析结果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法治论”，而否定了“政府管制论”和“银行发展论”。研究显示：更加正式的司法程序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稳定的作用，即法院审理案件审理程序的正式性越强，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大；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准入管制、劳动用工管制、征信管制以及退出管制在内的政府管制措施以及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不稳定或不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我们使用的数据，并进行了一些简单相关分析；第三部分讨论了回归模型以及实证检验结果；最后一部分对本文做了总结。

## 二、数据样本和相关分析

### (一) 变量描述

表 1 总结了有关变量的名称、定义、数据来源以及观测值。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进行的三项调查，即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发展项目 (Ayyagari *et al.*, 2003)、世界各国政府对商业的管制项目 (World Bank, 2003)、世界各国金融业发展水平和结构项目 (Beck *et al.*, 1999)。全部的数据样本是跨国的横截面形式。

首先，本文使用的中小企业发展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小企业发展水平的调查 (Ayyagari *et al.*, 2003)。这项调查涵盖了世界上 76 个国家，时间跨度为 1990 到 1999 年，但是相应的变量值是 10 年间的平均值。我们选取了 SME\_GDP 来衡量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即 1990 至 1999 年间官方定义的中小企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平均值。以雇工比例衡量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Beck *et al.* (2003a) 指出，发达的中小企业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因，但它是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采取与本文相同的指标，即中小企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Ayyagari *et al.* (2003) 发现，中小企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本文使用的政府管制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有关各国企

表1 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观测值
SME-GDP	1990至1999年各区间官方定义的中小企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平均值	Ayyagari <i>et al.</i> , 2003	36
lp	1999年一国的公司为获得合法资格、可以开业经营所需的审批手续的数量的对数值	Djankov <i>et al.</i> (2002)	86
ilabor1	1997年各国的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	Boreto <i>et al.</i> (2003)	86
imnl	1997年各国的工业或集体关系(工会法)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	Boreto <i>et al.</i> (2003)	86
social1	1997年各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	Boreto <i>et al.</i> (2003)	86
pcindex	1999年之前各国的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广度	World Bank (2003)	130
prcrd	1999年之前各国的私营征信机构的存在性指数	World Bank (2003)	133
GOFII	各国的破产程序的有效性	World Bank (2003)	130
aic	一国的初级法庭在有关兑现被退回的支票的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实质性和程序性的法定安排,即该类型案件审理程序的正式性	Djankov <i>et al.</i> (2003a)	109
dnhagdp6097	1960至1997年间的各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平均值	Beck <i>et al.</i> , 1999	161
pcdmhgdp6097	1960至1997年间各国商业银行对民营部门的贷款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平均值	Beck <i>et al.</i> , 1999	161
concen9097	1990至1997年间一国最大的三家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与其银行业总资产之比的平均值	Beck <i>et al.</i> , 1999	124
gdpp8089	1980至1989年间各国家内生产总值平均值的自然对数值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01)	68
ethno	各国五项人种语言学指标的平均值	La Porta <i>et al.</i> , 1999	83
latitude	各国的地理纬度的绝对值	La Porta <i>et al.</i> , 1999	104

业面临的管制措施调查 (World Bank, 2003), 以及一些基于此项调查数据的研究成果。这项调查涵盖了 133 个国家, 时间跨度因调查细目而异。调查细目包括各国的准入管制、劳动用工管制、征信管制以及退出管制。

1. 准入管制: 根据 Djankov *et al.* (2002), 我们用公司开业经营所需的审批手续数量来衡量政府的准入管制程度, 即 1999 年一国公司为获得合法资格、可以开业经营的所需的审批手续的数量, 取值范围从 2 到 21。所需审批手续越多, 准入管制程度越高。在回归分析中, 我们对它取对数值, 记作  $lp$ 。

2. 劳动用工管制: 根据 Botero *et al.* (2003), 我们采用三个变量来衡量政府的劳动用工管制程度, 赋值越高, 对应的劳动用工管制程度越强。首先是 1997 年一国的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 记作  $ilabor1$ , 取值范围从 1 到 3, 包括其他可能的雇佣合同指数、工作条件指数、工作安全性指数等三个方面。其次是 1997 年一国的工业或集体关系 (工会法) 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 记作  $iin1$ , 取值范围从 1 到 3, 包括集体协商指数、工人参与管理指数、集体纠纷处理指数等三个方面。第三是 1997 年一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 记作  $social1$ , 取值范围从 1 到 3, 包括高龄、工伤、死亡津贴指数、疾病以及保健津贴指数、失业救济指数等三个方面。

3. 征信管制: 根据 World Bank (2003), 我们引入了两个变量来衡量政府的征信管制程度。首先是 1999 年之前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广度, 记作  $pcrindex$ , 取值范围从 0 到 100, 赋值越高, 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范围越广, 对信贷交易的帮助越大。它包括有关的信息收集、传播、获得、质量等四个方面。其次是 1999 年之前私营征信机构的存在性指数, 记作  $prcrd$ , 如果存在, 赋值为 1, 反之为 0。

4. 退出管制: 根据 World Bank (2003), 我们引入了破产程序的有效性来衡量政府的退出管制程度, 记作  $GOFII$ , 取值范围从 0 到 100, 赋值越大, 破产程序的有效性越高。它包括破产成本、破产时间、清偿次序、有效破产结果等四个方面。

第三, 本文使用的法治水平数据也同样来自于世界银行进行的这项有关各国企业面临的管制措施调查 (World Bank, 2003), 以及 Djankov *et al.* (2003a) 基于此项调查数据的研究成果。根据 Djankov *et al.* (2003a), 我们使用了他们构造的司法程序正式性指标来衡量法治水平, 即初级法庭在有关兑现被退回的支票的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实质性和程序性的法定安排, 记作  $aic$ , 取值范围从 0 到 7, 赋值越高, 司法程序的正式性越高。它包括专业性/非专业性要求、书面/口头要求、法律辩护要求、法定的证据管理要求、二审控制、传唤要求、独立的程序性行动要求等七个方面。

第四, 本文使用的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有关金融市场的调查 (Beck *et al.*, 1999)。这项调查涵盖了 175 个国家, 时间跨度最长的从 1960 到 1997 年。

1. 银行业的发展水平：我们引入了两个变量来衡量银行业的发展水平，首先是 1960 至 1997 年间一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平均值，记作  $dmbagdp6097$ ；其次是 1960 至 1997 年间一国商业银行对民营部门的贷款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平均值，记作  $pcdmgbgdp6097$ 。

2. 银行业的结构：我们引入了银行集中度来衡量银行业的市场结构，记作  $concen9097$ ，即 1990 至 1997 年间一国最大的三家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与该国银行业总资产之比的平均值。

此外，考虑到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影响，我们引入了各国 1980 到 198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值的自然对数值，记作  $gdpp8089$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01) 数据库。考虑到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内生性可能，我们引入了人种差异度和地理纬度作为回归分析的工具变量，数据均来自 La Porta *et al.* (1999)。

1. 人种差异度：是一国五项人种语言学指标的平均值，记作  $ethno$ ，并且为方便计算，将原始数值除以变量最大值，把它的赋值区域调整为 0 到 1。

2. 地理纬度：是各国的地理纬度的绝对值，记作  $latitude$ ，将原始数值除以变量最大值，它的数值区域也被调整在 0 和 1 之间。

## (二) 相关分析

表 2 给出了回归分析中独立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1. 在准入管制程度较高的国家，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以及工业或集体关系（工会法）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都较高，而社会保障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较低。在准入管制程度较高的国家，司法程序的正式性较高，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范围较广，而私营征信机构较少存在，破产程序的有效性较低。此外，在准入管制程度较高的国家，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2. 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社会保障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都和工业或集体关系（工会法）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高度正相关。在劳动和就业法律以及工业或集体关系（工会法）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司法程序的正式性较高，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范围较广。在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私营征信机构较少存在，破产程序的有效性较低，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而在社会保障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正好与之相反。此外，在社会保障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银行业的集中程度较低。

3. 在司法程序正式性较高的国家，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范围较广，破产程序的有效性较低，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集中程度以及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

4. 在公营征信机构管制范围较广的国家，破产程序的有效性较低。而在

表 2 有关变量的相关分析

	lp	ilabor1	innl	social1	aic	perindex	prcrd	GOFII	concern8097	dmbagdp6097	pdmbagdp6097
ilabor1		0.6169***									
obs	86										
innl		0.4764***	0.5172***								
obs	86										
obs	86	0.2465**	0.0752	0.2310**							
social1											
obs	86										
ac		0.5662***	0.5793***	0.4240***							
obs	79										
perindex		0.3551***	0.2239***	0.1815*	0.0454	0.3420***					
obs	86										
prcrd		-0.3315***	-0.3064***	0.0105	0.3214***	-0.1436	-0.1352				
obs	86										
GOFII		-0.5351***	-0.2487*	-0.1318	0.3734***	-0.3695***	-0.3166***	0.4713***			
obs	86										
concern8097		-0.0879	-0.1121	-0.1731	-0.2637**	-0.1872*	-0.0748	-0.3630***	-0.1808*		
obs	77										
dmbagdp6097		-0.2761**	-0.3406***	-0.0912	0.3874***	-0.2897***	-0.0376	0.3807***	0.3641***	-0.2404***	
obs	80										
pdmbagdp6097		-0.2699**	-0.3672***	-0.0965	0.3317***	-0.3120***	-0.0689	0.3945***	0.3495***	-0.2385***	0.9451***
obs	80										
gdp8089		-0.4244***	-0.2624*	-0.0326	0.6897***	-0.3002**	-0.1808	0.5985***	0.6629***	-0.2557*	0.6531***
obs	53										

注:有关变量的简写参考附表 1,\*(\*, \*\*, \*\*\* )表明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达到 10% (5%, 1%)。

存在私营征信机构的国家，破产程序的有效性较高，银行业的集中度较低，而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5. 在破产程序的有效性较高的国家，银行业的集中度较低，而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6. 一国的银行业的集中程度越高，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一国的银行业的发展水平越高，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我们用来衡量银行业的发展水平的两个变量，即商业银行总资产比例和商业银行对民营部门的贷款额比例高度正相关。

### 三、回归模型及检验结果

#### (一) 计量模型

$$\begin{aligned} \text{SME\_GDP} = & \alpha + \beta_1 * 1p + \beta_2 * ilaborl(iin, sociall) + \beta_3 * aic \\ & + \beta_4 * pcrindex + \beta_5 * prcrd + \beta_6 * GOFII \\ & + \beta_7 * dmbagdp6097(pcdmbgdp6097, concen9097) + \epsilon. \end{aligned}$$

有关变量的定义可以参考表1。由于  $ilaborl$ 、 $iin$ 、 $sociall$  分别测度了不同方面的劳动用工管制程度，和 Botero *et al.* (2003) 一致，我们在分析中分别引入了这三个变量来衡量劳动用工管制程度。同样，在回归中，我们也分别和同时使用了表示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程度的  $dmbagdp6097$ 、 $pcdmbgdp6097$ 、 $concen9097$ 。回归式中的  $\epsilon$  表示残差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可能由中小企业发展水平内生决定，考虑到这种内生性可能，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回归分析方法，即两阶段的有效的广义矩估计方法<sup>4</sup>。使用要素禀赋 ( $ethno$  和  $latitude$ ) 作为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工具变量所隐含的信息是，我们认为要素禀赋仅仅通过影响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来间接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为了检验这种间接影响渠道以及工具变量的准确性，我们引入了过分识别的限制条件检验（简称 OIR 检验），检验结果是 Hansen's J<sup>5</sup>。如果零假设成立，那么我们有关要素禀赋的间接影响渠道和工具变量的准确性都得以确认。

#### (二) 回归结果

表3给出了有关的15组回归结果，我们有如下发现：

首先，法治水平对于一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程度有着显著而又稳定的正面作用。正如回归式1至15所示，不论采取何种回归方程的设定，司法程序的

<sup>4</sup> 与2SLS相比，二阶段GMM是更为普遍的一种估计方法，它对残差项的限制条件更少（如异方差和自相关等），而且在同样保证回归系数一致性的条件下，它比2SLS更加有效。

<sup>5</sup> 正如 Beck *et al.* (2002b)指出，OIR检验实质上是一种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在零假设下，其检验结果(Hansen's J)服从卡方( $n$ )分布，其中  $n$  是过分识别限制条件的个数。

表3 以SME\_GDP为因变量的两阶段的有效广义矩估计回归结果

回归式	自变量										constant	Hansen's J	obs	Uncentered R2	
	gdpp8089	lp	ilabor1	im1	social1	aic	perindex	prerd	GOFII	dmbged6097	pcdmlgdp6097	concer9097			
1	0.1509 (1.34)	-0.0142 (-0.17)	0.2056 (1.37)		0.0625*** (2.55)	0.0008 (0.55)	-0.0399 (-0.48)	0.0025 (0.91)	-0.3812 (-0.64)		-1.3622 (-1.16)	0.098	23	0.9514	
2	0.0609 (0.58)	-0.0701 (-0.63)	0.0339 (0.46)		0.0682*** (2.01)	0.0014 (1.41)	-0.0238 (-0.37)	0.0011 (0.43)	0.0838 (0.15)		-0.3506 (-0.33)	1.506	23	0.9677	
3	0.0370 (0.38)	-0.0818 (-0.98)	-0.00020.0697*** (0.0)	0.0119*** (2.44)	-0.0168 (-0.21)	0.0009 (0.36)	0.2475 (0.52)		0.2475 (0.52)		-0.1385 (-0.15)	1.72	23	0.9689	
4	0.1420 (1.41)	-0.0184 (-0.22)	0.1818 (1.47)		0.0641*** (2.64)	0.0007 (0.46)	-0.0267 (-0.30)	0.0021 (0.81)	-0.3638 (-0.61)		-1.2727 (-1.18)	0.082	23	0.9483	
5	0.0942 (0.86)	-0.0437 (-0.40)	0.0439 (0.50)		0.0718*** (2.03)	0.0012 (0.91)	-0.0244 (-0.34)	0.0017 (0.65)	-0.1085 (-0.16)		-0.6862 (-0.60)	1.307	23	0.9588	
6	0.0996 (0.96)	-0.0322 (-0.33)	-0.01530.0824*** (-0.21)	0.0017 (2.63)	-0.0230 (-0.25)	0.0018 (0.75)	-0.0665 (-0.11)		-0.0665 (-0.11)		-0.7386 (-0.73)	1.632	23	0.9586	
7	0.0820*** (3.95)	-0.0317 (-0.47)	0.1115* (1.80)		0.0576*** (2.83)	0.0013 (1.37)	0.0030 (0.68)	0.0012 (0.68)		0.1771 (0.67)	-0.7860** (-2.01)	0.001	24	0.9567	
8	0.0820*** (3.63)	-0.0107 (-0.12)	0.0308 (0.36)		0.0659*** (2.15)	0.0015 (1.54)	0.0256 (0.26)	0.0013 (0.78)		0.2944 (1.07)	-0.8220* (-1.83)	0.219	24	0.9408	
9	0.0958** (2.39)	0.0021 (0.03)	-0.03810.0714*** (-0.36)	0.0017 (2.80)	0.0290 (1.51)	0.0011 (0.27)	0.0290 (0.52)		0.0011 (0.52)		0.3490 (1.14)	-0.9045** (-2.08)	0.345	24	0.9339
10	0.0866 (0.32)	-0.0369 (-0.29)	0.1133 (0.30)		0.0589*** (2.85)	0.0012 (0.68)	0.0064 (0.04)	0.0012 (0.24)	-0.0112 (-0.01)		0.1730 (0.30)	-0.8296 (-0.34)	0 <sup>a</sup>	23	0.9562
11	0.0311 (0.27)	-0.0464 (-0.40)	0.0189 (0.23)		0.0598** (1.88)	0.0015 (1.56)	0.0422 (1.37)	0.0002 (0.08)	0.2943 (0.49)		0.3122 (1.15)	-0.3490 (-0.31)	0	23	0.9528
12	0.0320 (0.26)	-0.0450 (-0.43)	-0.02750.0618*** (-0.24)	0.0017* (2.14)	0.0467 (1.84)	-0.0001 (-0.40)	0.3439 (-0.05)		0.3439 (0.63)		0.355 (1.22)	-0.3150 (-0.29)	0	23	0.9499
13	0.0863 (0.37)	-0.0310 (-0.33)	0.1126 (0.38)		0.0590*** (2.32)	0.0012 (0.54)	0.0067 (0.05)	0.0012 (0.29)	-0.0110 (0.49)		0.1727 (0.29)	-0.8266 (-0.01)	0	23	0.956
14	0.0284 (0.25)	-0.0390 (-0.40)	0.0066 (0.08)		0.0598*** (2.01)	0.0018 (1.52)	0.0413 (0.40)	0.0003 (0.11)	0.3535 (0.52)		0.3442 (1.23)	-0.3434 (-0.32)	0	23	0.9584
15	0.0308 (0.26)	-0.0452 (-0.45)	-0.04440.0597*** (-0.39)	0.0020** (1.99)	0.0451 (1.96)	-0.0003 (0.44)	0.4341 (-0.09)		0.4341 (0.65)		0.4286 (1.50)	-0.3014 (-0.28)	0	23	0.9544

注: 我们使用了两阶段的有效广义矩估计回归方法, 并引入ethno和latitude作为工具变量。通过汇报 Hansen's J 进行了相应的工具变量检验, 即过分识别的限制条件检验。

\* \*\* (\*\*, \* ) 表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达到 1% (5%, 10%)。括号中是相应的正态分布检验结果。a0 表示内生变量正好被工具变量解释 (下同)。

正式性 (aic) 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 (SME\_GDP) 都有着稳定而显著的正面影响。一国的初级法院的案件审理程序的正式性越强, 该国的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大。具体而言, 其他的因素不变, 如果一国司法程序的正式性增加 1 个单位, 那么该国的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最多可以提高 8.24 个百分点 (回归式 6), 而至少也可以提高 5.76 个百分点 (回归式 7)。我们的结果支持了 Rudolf von Jhering (1898) 的论断, 而否定了 Djankov *et al.* (2003a) 的观点。虽然高度正式化的司法程序可以方便统治者控制判决结果, 保护其支持者, 惩罚其反对者; 但是案件审理过程越正式, 程序性越强, 案件受理法庭的中立性就越有保证, 从而可以防止当事人或相关利益方通过不正当手段干预案件审理。这一点对中小企业尤为重要, 因为中小企业规模较小, 资金实力较弱, 因此在法庭上多属于力量弱小者, 而高度正式化的司法程序可以避免可能的“制度扭曲”, 从而以中立的形式保护了相对弱小的中小企业一方。观察 Hansen's J 的统计结果, 我们发现, 以人种差异度 (ethno) 和地理纬度 (latitude) 作为工具变量来控制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内生性完全是合适的, 它们仅仅通过影响银行业的发展程度来间接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

其次, 政府的劳动用工管制措施对于一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程度有着显著但并不稳定的正面作用。观察回归式 7, 我们发现, 以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衡量的劳动用工管制程度 (ilabor1), 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 (SME\_GDP) 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一国对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法律要求越高, 该国的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大。其他的因素不变, 如果一国的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提高 1 个单位, 那么该国的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就能增加 11.15 个百分点。这部分地支持了有关劳动用工管制的效率说, 而否定了劳动用工管制的政治权力说。政府的劳动用工管制有助于规范中小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 而这种正面影响超过了政府可能的保持低效率就业或牟取政治利益的成本,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Hansen's J 的统计结果也支持工具变量的选择以及它们的间接作用机制。但是, 在其他包括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的回归式中, 劳动用工管制程度对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反映了政府劳动管制成本与收益在多数情况下比较接近, 因此有关政府的劳动用工管制程度对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正向作用机制是非常不稳定的。

第三, 政府的征信管制措施对于一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程度也有着显著但并不稳定的正面作用。观察回归式 3、12、15, 我们发现, 以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广度衡量的征信管制程度 (pcrindex), 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 (SME\_GDP) 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一国的公营征信机构对信用记录的管制范围越广, 该国的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大。其他的因素不变, 如果一国的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提高 1 个单位, 那么该国的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至少能增加 0.17 个百分点 (回归式 12), 而最

多可以增加 0.2 个百分点 (回归式 15)。这与 Pagano and Jappelli (1993) 的理论预期吻合, 征信机构通过提供和共享中小企业的信贷信息, 可以帮助缓解信贷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进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Jappelli and Pagano, 2001), 从而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样, Hansen's J 的统计结果也支持工具变量的选择以及它们的间接作用机制。但是, 在其他包括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广度的回归式中, 征信管制程度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也说明了征信管制的作用可能受到了非竞争性信贷市场结构的负面影响, 因此有关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广度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的正向作用机制是非常不稳定的。

第四, 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一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程度也有着显著但并不稳定的正面作用。观察回归式 7、8、9, 我们发现, 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 (gdpp8089) 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 (SME\_GDP) 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一国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该国的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大。其他的因素不变, 如果一国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1 个单位, 那么该国的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至少能增加 8.2 个百分点 (回归式 7、8), 而最多可以增加 9.58 个百分点 (回归式 9)。这与 Beck *et al.* (2003a) 的发现相同, 发达的中小企业是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这也支持了 Ayyagari *et al.* (2003) 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程度与人均 GDP 显著正相关的发现。同样, Hansen's J 的统计结果也支持工具变量的选择以及它们的间接作用机制。但是, 在其他包括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式中, 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 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影响是通过政府管制措施、法治和银行业发程度来发挥作用的, 控制了这些变量, 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正向作用机制是非常不稳定的。

此外, 我们发现政府的准入管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准入管制带来的公众利益增加以及可能的对行业在位者或官僚利益的保护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的效果接近, 进而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以工会法或社会保障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衡量的劳动管制对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不显著的影响说明了政府劳动管制可能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用工效率, 但是也可能阻碍了中小企业合理调整用工规模以及方便了政府获取特定的政治利益, 二者相较, 净效果不明显。私营征信机构的存在同样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 这可能反映了竞争性的信贷市场才是征信管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而退出管制对中小企业发展程度不显著的影响提醒我们设计一个合理的企业破产程序的重要性, 一方面要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也要保护企业家精神。

最后, 观察所有的银行业发程度变量, 包括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 合理控制了其内生性可能, 银行业的发展程度对中小企业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 考察银行业的发展水平, 较高的银行业发水平虽然可以解

决中小企业由于内部资本市场欠发展所导致的融资困难，但是较多的银行债权人也可能给中小企业施加了过多的外部监督，损害了经理人动机，权衡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效果接近，因而净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考察银行业的结构，垄断性的银行结构可能会导致信贷配给，减少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额，但是垄断性的银行也有助于缓解银行与中小企业间更为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了贷款人甄别借款人的动机，使得银行能够和中小企业建立长期借贷关系，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压力，比较这两种效果，同样，净效果不明显。

总结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在解释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成因时，以司法程序正式性衡量的法治水平的作用较为突出，而政府管制措施和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没有显著的解释力。更加正式的司法程序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正面而稳定的作用，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劳动和就业法律对劳动力保护程度衡量的劳动管制程度、以公营征信机构的管制广度衡量的征信管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不稳定的正面影响。准入管制、以工业或工会法、社会保障法律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衡量的劳动用工管制、以私营征信机构的存在性指数衡量的征信管制、退出管制，以及包括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在内的银行业的发展程度，都对一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程度有着并不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法治论”，而否定了“政府管制论”和“银行发展论”。

#### 四、结 论

基于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即政府管制措施、法治水平和银行业的发展程度，从而检验了“政府管制论”、“法治论”和“银行发展论”在解释中小企业发展程度时的作用。

考虑到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可能受到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影响，从而出现了回归分析中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引入了要素禀赋（包括人种差异度和地理纬度）作为控制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内生性可能的工具变量，并采用了两阶段的有效的广义矩估计回归方法，同时引入了过分识别的限制条件检验来检验工具变量的准确性以及要素禀赋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间接影响渠道。

分析结果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法治论”，而否定了“政府管制论”和“银行发展论”。研究显示：更加正式的司法程序显著而又稳定地推动了一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而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准入管制、劳动用工管制、征信管制以及退出管制在内的政府管制措施以及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不稳定或不显著的影响。此外，过分识别的限制条件检验结果显示，以人种差异度和地理纬度作为工具变量是准确的，它们只是通过影响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来间接地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程度。我们的发

现强调了司法程序正式化改革的重要意义，这对于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而整个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aron, James Robinson, and Simon Joh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369—1401.
- [2] Acs, Z.,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US Economy Lessons from the Steel Industry*, New York: Praeger, 1984.
- [3] Acs, Z. and D. Audretsch, “Innovation in Large and Small Firms: An Empirical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 678—690.
- [4] Acs, Z. and D. Audretsch, *Small Firms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ast-West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Allen, Franklin and Douglas Gale, *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 [6] Ayyagari, Meghana, Thorsten Beck, and Asli Demirguc-Kunt,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cross the Globe: A New Databas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127*, 2003.
- [7] Beck, Thorsten, Asli Demirguc-Kunt, and Ross Levine, *A New Database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999.
- [8] Beck, Thorsten, Asli Demirguc-Kunt, and Ross Levine, “SMEs, Growth and Poverty: Cross-Country Evidence”, *Working Paper*, 2003a.
- [9] Beck, Thorsten, Asli Demirguc-Kunt, and Ross Levine, “Law, Endowments and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b, 79, 137—181.
- [10] Beck, Thorsten, Asli Demirguc-Kunt, and Ross Levine, “Law and Finance: Why Does Legal Origin Matte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c, 31, 653—675.
- [11] Beck, Thorsten, Asli Demirguc-Kunt, and Vojislav Maksimovic, “Bank Competition, Financing Obstacles and Access to Credi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996*, 2003d.
- [12] Becker, Gary,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3, 98, 371—400.
- [13] Blanchard, Olivier, “Designing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mimeo, MIT, 2002.
- [14] Botero, Juan,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Regulation of Labor”, *NBER Working Paper 9756*, 2003.
- [15] Cetorelli, Nicola and Pietro Peretto, “Oligopoly Banking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Working Paper*, No. 2000-12, 2000.
- [16] Claessens, Stijn and Leora F. Klapper, “Bankruptcy around the World: Explanations of Its Relative Us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65*, 2002.
- [17] Demirguc-Kunt, Asli and Vojislav Maksimovic, “Law, Finance, and Firm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e*, 1998, 53, 2107—2137.
- [18] Demirguc-Kunt, Asli and Vojislav Maksimovic, “Firms a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Trade Credit Data”,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2001.
- [19] Demsetz, Harold,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67, 57, 347—359.
- [20] Djankov, Simeon,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 1—37.
- [21] Djankov, Simeon,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Cour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a, 118, 457—522.
- [22] Djankov, Simeon, Edward Glaeser,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b, 31, 595—619.

- [23] De Soto, Hernando, *The Other Path*.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1990.
- [24] Easterly, William and Ross Levine,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 1203—1250.
- [25] Esping-Anderson, Gøsta,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6] Friedman, Eric, Simon Johnson, Daniel Kaufmann, and Pablo Zoido-Lobaton, “Dodging the Grabbing Hand: The Determinants of Unofficial Activity in 69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76, 459—493.
- [27] Glaeser, Edward and Andrei Shleifer, “Legal Origi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 1193—1230.
- [28] Glaeser, Edward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3, 41, 401—425.
- [29] Guzman, Mark G., “Bank Structur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A Simple Macroeconomic Model”, *Economic Theory*, 2000, 16, 421—455.
- [30] Hallberg, Kristin, “A Market-Oriented Strategy For Small and Medium-Scale Enterprises, IFC Discussion Paper #48, 2001.
- [31] Hart, Oliver,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Bankruptcy”,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 [32] Harvie, Charles, “The Contribution of Micro-enterprises to Economic Recover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ast Asia”,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07*,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2003.
- [33] Harvie, Charles and Lee Boon-Chye, *Globalisation and SMEs in East Asia*.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K, 2002.
- [34] Hicks, Alex, *Social Democracy and Welfare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5] Jappelli, Tullio and Marco Pagano, “Information Sharing, Lending and Defaults: Cross-Country Evidenc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2, 26, 2017—2045.
- [36] Jentzsch, Nicola,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or Business Information Sharing”, *Working Paper*, 2003.
- [37] Johnson, Simon, Daniel Kaufmann,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Unoffici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7, 2, 159—239.
- [38]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9, 15, 222—279.
- [39] Levine, Ross, “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Evidence, and Mechanisms”, *Working Paper*, 2003.
- [40] 林毅夫和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第10—18页。
- [41] Love, Inessa and Nataliya Mylenko, “Credit Reporting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142*, 2003.
- [42] Marquez, Robert, “Competition, Adverse Selection, and Information Dispers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2, 15, 901—926.
- [43] Mauro, Paolo, “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681—712.
- [44] McChesney, Fred S., “Rent Extraction and Rent Creation 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7, 16, 101—118.
- [45] Miller, Margaret, “Credit Reporting Systems around the Globe: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Public and Private Credit Registries”, in Margaret Miller, ed., *Credit Reporting System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forthcoming, 2003.
- [46] North, Douglass,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Y: Norton, 1981.
- [47]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48] Pagano, Macro and Tullio Jappelli, “Information Sharing in Credit Markets”, *Journal of Finance*, 1993, 48, 1693—1718.

- [49] Peltzman, Sam, "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6, 19, 211—240.
- [50] Petersen, Mitchell and Raghuram Rajan, "The Effect of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on Lending Relationship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407—443.
- [51] Pigou, Arthur C.,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4th e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38.
- [52] Rajan, Raghuram and Luigi Zingales,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 559—587.
- [53] Rajan, Raghuram, and Luigi Zingales,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 69, 5—50.
- [54] Shleifer, Andrei and Robert W. Vishny, *The Grabbing Hand: Government Pathologies and Their Cu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5] Snodgrass, D. and T. Biggs,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mall Firm: Patterns and Polici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1996.
- [56] Stigler, George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1971, 2, 3—21.
- [57] Stiglitz, J. E. and A.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2, 393—410.
- [58] Tullock, Gordon, "The Welfare Cost of Tariffs, Monopoly,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67, 5, 224—232.
- [59] Von Jhering, Rudolf, *The Spirit of Roman Law through its Several Phases of Development*. Leipzig, Germany: Breitkopf und Härtel, 1898.
- [60]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Washington, DC., 2003.

## Government Regulation, Judicial Procedures, Ban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and-Medium Enterprises

TAO LI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judicial procedures and banking development in deter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and-medium enterprises (SMEs) around the world.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higher formalism of judicial procedure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s on SME development, while inconsistent or insignificant results are found for the initial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banking development. Our findings shed li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Es.

**JEL Classification** G21, L51, O17